

名家 30 年访谈书系

乐苑 秋实

中国著名音乐家访谈录

于润洋

马革顺

田 青

朱践耳

余 隆

周广仁

周小燕

郭文景

徐沛东

6



中国出版集团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名家 30 年访谈书系

K825.76
R368-2

乐苑 秋实

中国著名音乐家访谈录

K825.76
R368-2



中国出版集团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乐苑秋实：中国著名音乐家访谈录 / 人民音乐出版社
期刊中心编. —北京：人民音乐出版社，2008. 12

(名家 30 年访谈书系)

ISBN 978-7-103-03652-5

I. 乐… II. 人… III. 音乐家—访谈录—中国—现代
IV. 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9831 号

责任编辑 陈荃有 杨 旭

出版发行 人民音乐出版社
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

网 址 www.rymusic.com.cn

邮 箱 rmyy@rymusic.com.cn

邮 编 100036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 / 16 印张 16

印 数 0,001 — 5,000 册

定 价 36.00 元

出版说明

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。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措。30年来，我国文化出版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正在掀起。作为我国文化出版业的“国家队”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，策划组织了一系列重点出版物和重大出版活动，力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“大合唱”中展示自身的风采。

在一系列重点出版物之中，《名家30年访谈书系》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重点推出的一套书系。这套书系，针对改革开放30年来表现相当活跃、成就非常突出的思想、经济、科学、文学、音乐、美术等六个领域，分别遴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名家，进行一对一采访，力图通过他们的感性亲历和理性提炼，呈现“改革开放”这个大主题在宏观和微观、文化与生活的运演轨迹，再现“改革开放”这一洪流对社会与个人、命运与细节的滋润熨帖。同时，访谈也是一种美的形式，访者、谈者与读者，沉浸于共有的记忆，亲切而和谐。

本套书系共包括《战略高度——中国思想界访谈录》《万千气象——中国著名文学家访谈录》《风雨兼程——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》《科技兴邦——中国著名科学家访谈录》《画坛春秋——中国著名美术家访谈录》《乐苑秋实——中国著名音乐家访谈录》等6种图书，分别由集团公司所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、人民美术出版社、人民音乐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编辑出版。各书单独成卷，风格体例统一，共同成为对改革开放30年的高声歌唱、真诚铭记。

《名家30年访谈书系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二〇〇八年十月

中国著名 访谈录 音乐家

目录

- 1 我的30年学术科研历程（于润洋） 005
- 2 我指挥生涯的爱和乐（马革顺） 037
- 3 漫漫「非遗」路，上下求索心（田青） 067
- 4 交响乐是我人生的表达方式（朱践耳） 097
- 5 北京，我指挥生涯的春天（余隆） 125
- 6 中国钢琴教育是我人生的寄托（周广仁） 155
- 7 我是幸运的，赶上了一个好时候（周小燕） 169
- 8 只有个性，成就标识（郭文景） 191
- 9 见证时代，创作人生（徐沛东） 219

编后记 247



本书采访者简介

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王 勇 男,音乐学家,文学博士。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副主任。上海市“浦江人才”,连续8年担任上海市儿童基金会爱心大使。曾发表文论八十余万字,在各地举办音乐讲座百余场。同时,他也是上海观众熟悉的著名节目主持人。

刘小龙 男,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讲师。1996年起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习,先后获得学士、硕士和博士学位。主攻西方音乐史,对于德国作曲家J.S.巴赫、贝多芬,以及19世纪早期欧洲音乐文化有专门研究。

任 飞 男,2001年入河南师范大学音乐系,2005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,师从田青研究员,2008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,师从王耀华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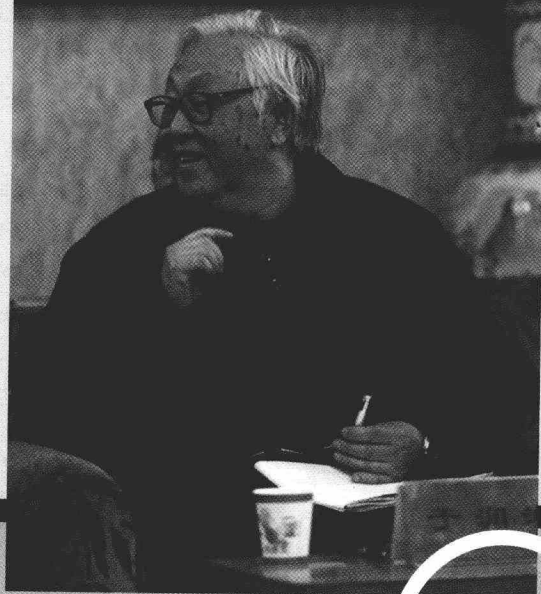
张 萌 男,70年代生人。先后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、中央音乐学院。历任河北师范大学音乐系钢琴教师,《音乐周报》编辑、记者,新浪娱乐网络编辑。现为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,同时任职《人民音乐》杂志。

陈志音 女,高级编辑、资深文化记者、音乐评论家。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、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理事,多所高校客座教授,国家大剧院院刊主笔,《音乐77》副主编。曾任《音乐周报》社副总编辑。长期从事歌曲创作与音乐评论、音乐理论及新闻的撰写。

陈荃有 男,文学博士。人民音乐出版社期刊中心主任,《音乐研究》常务副主编。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,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副秘书长、中国音乐传播学会理事,另获聘多所高校兼职教授。所选题、主编、责编的期刊、图书、文章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。

陶立新 男,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声乐副教授。1998年获第八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荧屏奖、综合素质第一名。2004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,师从杨燕迪教授,攻读西方音乐史专业西方歌剧研究方向博士学位。

2007年11月2日—4日



于润洋
Yu Runyang

1

我的 30 年学术科研历程

男，1932年7月出生，辽宁沈阳人。音乐美学家、音乐史学家、音乐教育家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、博导。195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，1955年考取莫斯科音乐学院乐队指挥专业，后改派华沙大学主修音乐学。1960年回中央音乐学院从事西方音乐史学与音乐美学的教研工作。1983年至1992年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、院长。先后担任中国音协理事、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文化部高等艺术院校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等职，同时还被聘为多所院校客座教授。发表有影响的专业论文五十余篇，出版论文集、专著、译著十余部。一生获奖无数，除了1993年所在的音乐美学教学集体荣获“全国高等院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”外，还荣获了“全国优秀教师”、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、“波兰文化贡献勋章”等荣誉称号。

【访谈手记】

若从我1989年担任首个就职单位的新闻通讯员算起,到今天在出版机构作为职业的期刊编辑,前后已历时二十载。虽然涉足新闻出版业的工作有这么多个年头,但做这种写实性的访谈还是头一遭,更何况是面对一位大家十分敬重的学者呢?

记得与于润洋先生的首度交往是在13年前厦门大学的研究生课堂上,当时于先生受邀为我们厦大音乐系的几位研究生及教授们讲学,历时一个多月。正是那次讲学,不但结识了于先生其人,更结识了他博学、宽厚、自谦的学者风范。再往后由于事业及生活所需,我频于搬迁,先到上海攻读博士学位,转而进入北京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工作,居所与单位地址也前后变动,其间虽与先生保持联系,却并不经常。直到进入2004年,我竟有幸和于先生站在同一条战壕里——共同主编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《音乐研究》。

有如上的交往和学术渊源,所以半年前本书的访谈小组聚会分派采访任务时,大家共同推举由我来专访于润洋先生。

应该说这是个苦差事,原因主要有三:一是于先生乃专长西方音乐史学、西方音乐美学的大家,且数十年不辍此业,成果、声名显赫,而我仅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略领门道,近年又穷于编辑书刊,穷于为他人做嫁衣的琐细工作,可以说与老人家对话的学术基础、专业基础都不存在;二是于先生现居住在北京东郊的通州,平时深居简出,特别是近几年,随着年岁增长、身体欠佳,主要还是他心仪的科研项目的吸引,于先生已越来越少地参与社会上或学术界的各种活动,再与他做长时间的对话,恐怕先生的时间、心境、身体都不能保证;三是前已述及的,本人从未做过此类访谈工作,心中未免忐忑。

不想5月份与先生电话沟通之后,他竟爽快地答应了。但之后由于我本人工作上的无休止忙碌,加上汶川大地震、北京奥运会对正常工作的冲击,使我们约谈的时间了无期限,直至主管单位催促图书出版的日期迫近,才决心推掉各种事情,在11月初的第一个周末,与先生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漫长谈话,也便有了大家看到的这篇极为写实的“访谈录”。

——陈荃有

时间:2008年11月2日下午

地点:北京市通州区阳光好东东小区

陈荃有:周末的时候还打扰您来聊一些问题,实在不好意思。我今天想把谈论的话题大约分成为三个部分:一部分是请您介绍一下您这些年的学术历程,对获得的这些成果,做一下梳理。第二是想请您以自己的眼光来梳理一下学术界在这些年的发展情况,包括对一些理论现状呀、包括对今后学术界的发展等进行一些阐述。因为,您是始终关注着音乐学术界的发展的,也是很关心整个学术界的建设的,在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段上,您都有很重要的文章发表,这在包括宋瑾、姚亚平等人的文章中中都持这种看法。比如选登在《音乐美学史学论稿》中的第一篇关于《器乐创作的艺术规律》的文章,是1979年时候《人民音乐》杂志登的文章,您说这是篇个人纯学术的文章,还是有些时事评论性质的?两个因素都有,确实我觉得您在那个时候写出这样的文章肯定是很重要的;包括大家一直都有好评的您的关于《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》做音乐学分析的那篇文章,我看好像就在前两年的时候,在《人民音乐》上还有见到再评价您这篇成果的文章;包括您在文联第三届文艺评论奖获奖的那篇文章,在《人民音乐》登的那篇(指《关于我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想法》)。我好像感觉到您这些年来在各个时段上都有一些特别重要、大家都是特别能够从中受益的文章发表。所以说,您可以结合学术的现状,谈谈整个学术界的情况。因为您不是像有些学者,只是埋头自己所从事的方向上的学问,不关心自己学问之外的那些事情,而您是一直关心着学术界的整体学科建设的。还有就是谈谈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呀,因为您1983年做副院长,1988年至1992年做院长,关键是那几年是最不容易做的几年,您不但把自己的任期做满,而且在那几年里中央音乐学院的发展也是很好的一个历史阶段,取得了不少的成绩,1991年还被评为全国文化系统的先进单位。大致也就是这几个方面吧。

于润洋:那我就说一说吧,有需要补充的问题你就问。

陈荃有:可以。

于润洋:我那么粗粗想一想,在学术上呢,远的不说,就说一说改革开放以来吧,这30年我是属于亲自经历的,当然也参与了一些工作,比如音乐理论呀、音乐教育呀这些方面,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吧。但我想来想去,认为关键的就是这30年的改革开放,逐步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松、比较自由的这么一个学术环境,这很重要,没有这些话什么也干不成,因为我回想了一下,在那之前我也干了不少(这时,谈话被家中的电话铃声打断)……所以整个学术上的在过去比较禁锢的那些东西逐步地消失,学术环境变得比较好了,使我们的思路也宽一点、看到的東西也多一些,而且发表东西也自由容易一些,像我们写的东西也都比较容易发表出来……

陈荃有:在“文革”期间也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呀。

于润洋:是啊,没有地方发表,而且也出问题呀,所以,问题主要在这儿。学术上来说,我也不止做了30年了,从1960年回国,都快50年了。这50年基本上我所关注的也就是两个方面,一个是西方音乐的历史、现状这个问题,另外的方面就是音乐美学,主要是这两个方面。有的同志从事的领域比我宽,在做工作的同时还从事民族音乐学呀、音乐批评呀,我在这个方面比较差……

陈荃有:不过,您的情况也不好说,您除了从事音乐史学、音乐美学研究,其实呢还包括音乐批评,您在各个阶段上在《人民音乐》等地方发表的那些重要文章,也是属于音乐批评的。

于润洋:我不像人家从事音乐批评的,甚至就专门从事这个领域。事实上呢,当然我也在做。要是注意呢,从字里行间吧好像也有,但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工作。一开始呢,我从国外回来,是1960年的时候,到66年,中间只有五六年的时间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什么都没有了,干待了10年。“文革”前的五年多呢,搞西方音乐史、上课,主要是给学生上小课、上大课,同时也给音乐学系的高年级讲一些西方音乐史、音乐美学,也算是开始了一点,主要是搞西方音乐史。

陈荃有：那个时候主要是教学？

于润洋：主要是教学。那时候很少写文章，也写过，但很少，属于教材领域的东西。

陈荃有：您60年回来，那个时候《音乐研究》也停刊了，也没有什么您可以登载文章的媒体。《音乐论丛》有的时候会出版一些，数量有限。

于润洋：基本上没有。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我切实感觉到，你搞的音乐历史，比如说西方的音乐历史，到一定程度你就很难往前再走，也就是书本里的那点东西。我就深深地感到，我们音乐史学的研究——别的我不敢讲，就是中国的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，缺乏理论的深度，缺乏根基性的那些东西，这些书呀、文章呀基本上大同小异。

陈荃有：您这个看法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？

于润洋：这个，我想想……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就开始有了。

陈荃有：是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？工作一段之后会产生一些看法。

于润洋：是的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感觉到了这个问题比较突出。然后呢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了，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开设西方音乐史课程，而且比现在的学时都长，现在是一个礼拜一次，讲两个钟头。

陈荃有：授课对象是哪些人？

于润洋：授课对象是音乐学系的全体学生……那也不是全体学生啦，我是1978年开始教，那就是第一届啦，就是王次炤他们那班，二三十人吧。

陈荃有：也就是“文革”结束后招生的第一届。

于润洋：是第一届，也是第一轮课程，授课也是“文革”后开始第一次讲授外国音乐史。那个时候课程的分量比较大。我那时候是一个礼拜两次课，一次三个小时，而且讲一年半时间，不是一年。因为都是音乐学系的人，而且他们也非常愿意学习，因为他们刚从社会上进来，王次炤呀、修海林呀、刘经树呀、余志刚呀……就是这一班的。

陈荃有：那个时候您这么大的课时量，教材用的是什么样的教材呀？

于润洋：我没有教材，完全都是自己准备的。我现在还有七本东西，全是自己写的，拿钢笔写的。后来我请黄晓和老师来接下了这件事，因为后来要我当副院长什么的，我还有音乐美学的课程。后来，黄晓和又讲了几届。

陈荃有：您的一年半的课程，是怎么个开法？是两届学生可能合着开一次课？

于润洋：我就开了第一届，后面的就让黄晓和来接了。这使我深感到加强理论方面奠基工作的重要，要不然很难深入。我开始转向音乐美学，这时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。我记得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评论汉斯立克，因为汉斯立克出了一本书，叫《论音乐的美》。

陈荃有：这本书（指于润洋先生个人的论文集《音乐美学史学论稿》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2版）上好像也收录了，在第二篇。文章好像是1981年在咱们《音乐研究》上首先登出来的。

于润洋：这是我最早的一篇文章。

陈荃有：这是一篇长文章啊，也很有影响。

于润洋：这篇文章当然有些影响。所以，从1981年的时候开始，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了，走进这个领域里面已经二十多年了，而且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的、西方现代的东西。因为再早的东西一般也没有什么争论的，一般都是已经有定论的，但是到20世纪初或者稍早一些的时候，这时候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了，这个领域中国过去一直抵制。汉斯立克的东西早就翻译出来了，哪只一本呀，在我们学校的资料室里早就有江文也先生从日文翻译过来的，这是就我所看到的材料。当时根本不去注意这些材料，因为它太强调形式了。当然，我从这个开始，关注这些问题，后来写些文章，到最后成了这部书，就是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》（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），差不多二十多年时间了。

陈荃有：也就是磨砺这本书经历了漫长的时间。

于润洋：也就是经历了20年的时间。你看，我1981年发的这篇文章，我的书是2000年出版的，差不多20年的时间。所以，有的人问我：你这本书写了多长时间？我很难回答。实际上20年来不断地在积累、磨合、认识，也再反思一下，对总体有个看法。关于这些，居其宏的文章里面分析得还是比较透彻，就是我们学校的学报刚给发表的，他给梳理了一下，从一开始到这本书出版的过程，基本上比较清晰。

当然，我觉得我做的这个还是从客观要求提出来的，倒没有想太多别的东西，就认为不这样做不行了。然后从这个……90年代比较靠近后期了吧，我就又转回到西方音乐史上来。我学的是西方音乐史，毕业后搞了五六年西方音乐史，然后搞了20年的音乐美学，然后又回到西方音乐史。我原来就想，我总还要回到历史上来，我个人对历史更感兴趣。因为很多理论问题如果没有历史观念的话，大家都在讲一些都知道的事实呀什么的，就没有多大意思了……

陈荃有：就是要以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问题。

于润洋：要好一点。大家也都感到这些，觉得我这部分的文字与别人的不太一样，与写西方音乐史的那些教科书呀、音乐的分析呀什么的不太一样。所以，

我又转回来了。转回来之后呀,最近的成果就是刚刚出版了一本书——《悲情肖邦——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》(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)。再就是,最近的、转回来之后,我一直在积累这些资料,我是想写一本肖邦整个的生活、创作方面变化的大部头的著作。但我想先抓住一些最重要的东西、比较核心的东西,在我看来是最有价值的一些东西,我想先写一本书。写了这本书,就会使接下来的书在思想方面、脉络方面会更清楚一些。现在这本书完成了,下面我已经开始着手肖邦全部创作的更完整的这本了。

陈荃有:还是关于肖邦的?

于润洋:还是肖邦的。因为这是我的一个课题了。你想,2002 年为了这个,我就又到波兰去了一次,又待了两三个月,就为了写这本书做些准备。我在那儿的两三个月,可以讲,波兰自己的以及国际上对肖邦研究的情况,我基本上都知道了,因为我整天看书……

陈荃有:那么,我就有些疑惑了,西方有那么多的音乐家,您为什么偏偏就选择了肖邦了呢?

于润洋:我想这里边有两条:第一是因为我确实喜欢肖邦的音乐。和别人相比,艺术上的魅力、给我感染的东西最强的一个音乐家是他;也可能因为我弹过钢琴,我从小学过钢琴,肖邦的东西从小就弹过一些,可能和这个有关系,对他的东西本身就喜欢。贝多芬的音乐我也喜欢,但不能和他比,没有那么亲切,没有心灵上的沟通和震撼;再晚一点的钢琴音乐也很漂亮,我也喜欢,比如德彪西的音乐,我也很喜欢他的钢琴作品,但是都不能和肖邦比。

陈荃有:这由于您原来弹琴、出于专业上的喜好,对他的音乐风格也比较喜欢。那么,有没有因为您 50 年代曾经留学波兰的缘故?

于润洋:那当然有了!我 1956 年到 60 年,在那里待了四五年,整个感觉对

那个民族,对那个民族的性格,对他们的品质,以及他们的艺术,都特别了解。这不只是肖邦了,当然主要是肖邦了。那里对他的研究也很多,包括博物馆、研究所、肖邦学会等都在那儿,所以这两条促使我从事这项研究。我的目的倒不是单纯让大家了解一个肖邦,我的目的是想寻找一个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音乐,包括经典的音乐,究竟怎么看待?

陈荃有:因为您喜欢肖邦,因为刚才那两条原因,促使您去专注肖邦,但肖邦其实也是您的一个切入口,通过研究肖邦,来使中国人更好地来认识西方音乐……

于润洋:怎么样来认识西方音乐,怎么样来分析西方音乐,因为毕竟不一样,你要看我的这本书就会发现,比较起来就能看出来。那么,我在讲这个过程,就是从音乐历史到音乐美学,然后再回到史学,是这么一个大概的过程。

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思想,我在好几篇文章中都谈了:音乐学研究呀,理论和历史不能分割——这是我的看法。因为音乐学,我比较同意西方最早的关于音乐学的观点,阿德勒在 20 世纪初就提出来了,就是说,理解音乐实际就是音乐的历史,音乐理论的一种比较深入的、层次比较高的一种研究,当然它不可能都研究,底下有这么多的分支学科,但它应该涵盖这两个大的方面。那么我认为,作为音乐学家,理论和历史这两个方面不能割裂,而现实恰恰是被割裂开了,这包括在西方,在中国更是这样。所以,你看搞西方音乐历史的人去关注音乐美学的人很少。有,但很少,你像姚亚平这样比较出色的就更少了;有的人西方音乐史搞得很好,很精也很深入很仔细的,但他们不太关注美学这些东西,他们虽然特点都不一样,做得也很优秀,但我总觉得这样存在着一定的缺陷。

陈荃有:您刚才说的历史与理论问题,历史容易理解,理论指的是什么呢?指的是对音乐形态进行研究的吗?

于润洋:还不是。理论,我主要指的是音乐美学、音乐史学的理论,艺术学的、社会学的,我指的是这些。因为,在进行具体的音乐分析的时候,必须有这些东